



人物名片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立人三部曲》《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主编)等。



余世存：“当代读经生”的“古今中外”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文 郭然/图

“孔子要是活到现在,他肯定是穿着皮鞋西装,周游列国,英语肯定比我们讲得好,对西方的理解肯定比我们还要深,那才是真正的孔子。”他神情笃定地说,真正的孔子,一定是通古今之变、贯中外之学的。

他对孔子的“画像”实有所指,在当今世界上,可能没有那个民族像我们承受着“古、今、中、外”这四端力量的撕扯,需要有人来安顿。十年前,余世存是在撕扯和焦虑中开始读经的,“焦虑来自对中国日益复杂的社会状况,与其思潮坐标、参照不能长久匹配的担忧。”在他看来,重构思想坐标,要以天地自然系统、域外主流文明、优秀传统文化为参照,“如果我们破坏了自然环境,以征服、使用环境为目的;如果我们妖魔化人类主流文明,以批判、隔绝域外文化为发展的前提;如果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只是以消费、复古、记诵辞章等为满足,那么我们的言行不过是加剧了时代的混乱和碎片化。”

带着自己的现实困惑,余世存开始了十年的读经生涯。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等我国古代伟大学者、思想家的学说和经典做当代解读,先后出版《老子传》《立人三部曲》《非常道》《家世》《人间世》《大时间》《东方圣典》(主编)《时间之书》等作品,关注点从人民国家到人间家世,从世道人心到东方智慧。余世存也因此被誉为“当代读经生”。

不久前举行的第三届孔学堂·国学图书博览会期间,余世存带来了《为国学传承发展注入更多原创动力》的主题讲座,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记者看到,这位曾将系列读书札记命名为《一篇读罢头飞雪》一书出版的先生,头上也开始落雪了。

弥合“古今中外”四端,参与世界文明的现代演进

古代中国,百家经典是普通人无法拥有的资源和能量,平民的一生大都屈从于掌握知识的特权阶级。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知识共享的现代国家,每个人都有权与闻这些中国原典,拥有中国人积累上千年的智慧结晶。“然而由于我国之前国学普及教育的不足,忽略了本国传统经典,这是现代教育的不足。”在中国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当下,余世存呼吁对古代传统文化经典的重读,不仅积极作用于每一位读者的知识建构,而且必将在国家文化复兴、民族自信建立的层面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者: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当今世

上还没有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承受着“古、今、中、外”这四端力量的撕扯。不晓得这种感觉对不对?

余世存:你这个感受特别对。如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话语来说,就是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现代性。其实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他们也没有完成他们的现代性。不论中外,现代性其实都有待完成。

我们曾经有一种误解,以为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把他们的现代性当作我们现代性的标准,现在认识到这是不对的,他们有他们有待完整的现代性,我们也有我们有待完成的现代性。“现代性”是一个西方话语,用中国话语来说就是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古今之变,所以我们才撕扯得这么严重。

这些年来,我们从官方到民间,从上而下都在推动传统文化的回归。但是传统文化对我们当下人来说,好像更多的只是一个装饰性,真正内在的东西不够充实,这是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以至于一个人的内在与外在也在撕扯。找不到心灵安顿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古人或者古典那里有东西,以为把他们拿出来重新包装,印刷出版就可以了,实际上并没靠近古人或古典。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以我比较熟悉的出版为例。前不久我买了一套书,是一些大学教授花大功夫整理的。我后看很失望,花费了大量的物力人力,做得好看是好看,但内容仅仅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注解而已。弘扬传统文化,或者将传统文化引入现代,不是简单的加个注解,或者翻译成白话文就可以了的。

记者:出版的角度还是知识性的层面。如果还往后推一步的话,就是各个群体之间难以在对话中形成共识的问题。

余世存:怎么造成这种局面的?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来看文化人的演变之路。当时的第一代、第二代文化人,无论是梁启超那一代也好,还是胡适那一代也好,不管他们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他们跟传统文化都是不脱节的,他们就在其中,真的就是学贯中西的大儒。但是现在有些文化人把“大儒”理解偏了,以为大儒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下一代的儒家,连中国的道家、墨家、法家和名家都没有兼容过来。

我们现在比不上孔子,用我的话来说,要是孔子活到现在,他肯定是穿着皮鞋西装,周游列国,英语比我们讲得

还好,对西方历史的理解比我们还要深,那才是真正的孔子。对吧?

中西文化对话处于第二阶段,需将经学拉回诸子百家时代

余世存认为,仅仅拿孔子与西方对话,是不够的,真正能够对西方文明有大启示的,还是中国文化创世纪时代的一些经典,要将这些文化经典从经学的行业拉回到诸子百家时代,必须在个体层面上对诸子都要表达出足够的关怀,中西方才能构成平等的对话。在刚出版的《微观国学》一书里,余世存从老子出发,为先秦诸子的著作与思想正本清源,用当代人的语言和视角去解剖文本,寻求古人智慧与当代中国的连接;庄子的人生自觉是弃绝名利,虽明了苦谛仍历遍人生诸苦的傲然自信,这份自信当能鼓舞读者直面人生的难;孔子的一生是“夫子自道”的一生,他知行合一的人生准则,值得今天的人们一生参照;孟子霸气与勇气兼备,面对世界时“舍我其谁”的气魄,是其在面对困厄、诱惑、迎难而上、舍生取义的高贵品格……他试图带领读者,用古人积累千年的智慧武装头脑,共同对抗时代的困局。

记者:您解读孔子的方式有象征意义,就是儒家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如何走向现代化,与世界对话的问题。西方从知识理性和宗教信仰为出发点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制度。我们拿什么与之对话?当下中西文化的对话,处于怎样的阶段?

余世存:现在应该是到了第二阶段,就是互相不服气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彼此感觉很亲切,我们有孔子,他们有苏格拉底,孔子讲的跟苏格拉底讲的差不多,墨子讲的跟亚里士多德讲的差不多,彼此都在找共同点;现在走到了第二阶段,就是找差异了。第三阶段是一个化和、整合的阶段,离这一阶段还有一段路要走。

现在,拿孔子与西方对话,是不够的,是有巨大的局限性的。真正能够对西方文明有大启示的,还是中国文化创世纪时代的一些经典,比如说《易经》《礼记》,要将这些文化经典从经学的行业拉回到诸子百家时代,必须在个体层面上对诸子都要表达出足够的关怀,中西方才能构成平等的对话。否则只是强调我们《论语》,要对西方产生影响是很难的。

比如《道德经》一书,我们没有做过多的宣传和推广,但它在西方的影

响是非常强大的。就我所知,在世界范围内,《道德经》的译本数量仅次于《圣经》,德国人每隔几年就要重新找人翻译一遍《道德经》。《道德经》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直抵人心的个体层面,那五千言晦涩难懂,但越琢磨越有味道,所以西方人才那么迷恋《道德经》。

记者:现在阳明学很热。王阳明可以弥补孔子的不足么?

余世存:王阳明在中国和东亚的影响很大,确实很了不起。中国文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明,每隔几百年就有人自觉进行系统的文化大整理,孔子也好,朱熹也好,王阳明也好,他们都有这种自觉意识,在整理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学术和思想体系,并对当时和后代产生重大意义。王阳明作为目前为止最后一个集大成者,他是有效的。

再就是,王阳明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地方,就是每隔几代人一定要探讨什么叫良知,什么叫仁爱,我们是从情感出发的伦理本位,这很符合东方人的特点。所以梁漱溟讲过,中国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人拉回到伦理意识当中,拉回到情感意识当中。

完成新文化运动未完成的任务,文化的根本是时空

余世存认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空偏好,看待传统文化的一个角度,就是要认清时空。“时空可以分成东南西北和春夏秋冬四个维度。”在他看来,从“情感”出发的孔子,代表儒家在东方的维度,即春天维度,是“仁爱”;从“逻辑”出发而“善辩”的墨子和孟子占据西方维度,即秋天维度;“眼冷心热”的老子庄子占据南方和北方两个维度,即夏天和冬天的时间维度。这些都是时空,它构成了中国人精神的完整性。

记者:在“古、今、中、外”的撕扯之中,您个人的选择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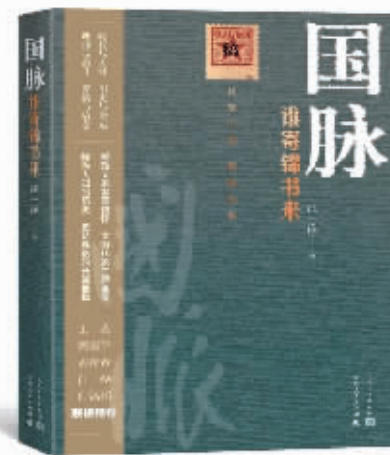
余世存:这些年的读书思考,我觉得是对新文化运动未完成的任务,做一个完成,做一个新的阐释。所以我的工作呢,可能就是对你说的“古今中外”,做一个新的观照和参照。我这些年一直在做这项工作。

我发现,我们要重建东西方文化共识的话,就必须回到根本上来。比如说,西方文化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要回到数字“0”和“1”的位置上来,因为“0”和“1”构成了现在的移动互联网,组成了我们的虚拟空间,我们任何的文字、语音和图像都可以用“0”和“1”来编码。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我们要重新跟西方人进行对话,就要回到中国文化的根本中。

文化的根本应该是时空。我觉得我的时空论是对前人的一个总结,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再发现。

记者:那有没有引入到科学层面的视角?

余世存:是的,对时间和空间的观察本身就是一种科学思维,通过科学的视角来实现中西方文化的一次对接。再如,老子讲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实可以和西方的地理决定论、地理空间影响论形成一种很好的对话。



主题书坊

《国脉——谁寄锦书来》书封。(资料图片)

黔籍旅美作家汪一洋携新作在筑签署

《国脉——谁寄锦书来》:

讲好中国邮政百年故事

9月7日,黔籍旅美作家汪一洋携新作《国脉——谁寄锦书来》在贵州书城举行新书分享暨签售会。该书是首部讲述中国邮政百年风云的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著名作家王蒙、周国平,著名评论家何镇邦、白桦,著名导演高希希等人对该书给予高度评价。该书出版以来,先后入选2019年6月“中国好书榜”书目、贵州省第十五届“五个一工程”奖、第三届孔学堂·国学图书博览会“30本最受读者欢迎国学图书”。

该书以“邮政”为主线,勾勒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小说以邮政工人秦鸿瑞的成长历程为线索,以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为主线,串起了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九一八事变、一·二八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再现了一个个斗争场面,谱写了一部中国邮政史和工运史。作者精心塑造了秦鸿瑞、方执一、郑开先等几个邮工出身的工运旗手形象,通过三人不同道路的选择,揭示了只有共产党才是先进的、正确的政党,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历史必然性。

活动现场,汪一洋表示,写作该书的契机,是著名导演高希希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准备合作拍摄一部百年邮政题材的影视剧。此事已策划并推行了大半年,也请编剧创作了剧本大纲,但都不大理想。后来决定请一位作家先创作一部小说,再根据小说来改编影视剧。汪一洋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接受了创作任务。

“说实话,当时我对邮政的理解仅仅局限于邮票、邮差的层面。在互联网时代,当年的‘家书抵万金’已演变成虚拟网络中的一封封电子邮件、手机里的短信微信。我们的生活似乎越来越不需要传统的邮政服务了。”汪一洋坦言,为了讲好中国邮政的故事,她阅读了一桌子的史料,“读完都可以从‘邮政史’博士专业毕业了”,走遍大半个中国采访了上百名邮政工人,百名采访对象中有90多岁的老人,有几位邮政部的老部长,有局级的领导,还有一线邮递员,山区的乡镇邮递员等。

作者还透露,小说主人公秦鸿瑞的原型是新中国首任邮电部部长朱学范。朱学范是旧中国邮工出身的工人运动领袖,从邮务生到上海总工会主席,直至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且多次出席国际劳工会议,可谓经历传奇。为此,她特意采访了朱学范的五位子孙,拿到了许多一手资料。

分享会最后,汪一洋说,《国脉——谁寄锦书来》只是上卷,时间线从1896年写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下卷名为《八千里路云和月》,书写1978年至2018年间改革开放40周年的辉煌历程。

小说作者汪一洋(本名汪洋),为贵州省首批对外传播智库专家,已出版《洋嫁》《在疼痛中奔跑》《永不放弃自己》等作品,先后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美国国会“杰出华人作家奖”“乌江文学奖”、贵州“青年作家突出贡献奖”等奖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汪一洋近照。(资料图片)

